

# “以药补医”终结战号角吹响

■本报记者 龙九尊

“如果要问当前医疗卫生领域最需要革除的机制性弊病是什么?我想绝大多数同志的回答是‘以药补医’。”卫生部副部长陈竺近日表示。

同时,时间表业已敲定:2012年在300个试点县先行推开,2013年在县级医院普遍推行,2015年在所有公立医院全面推开,最终在“十二五”全面取消“以药补医”。

由此,沿用了60多年的“以药补医”正式进入终结倒计时。3年之后,这项饱受诟病的医疗弊政将成为历史。

非改不可

在主管医改的一位高层官员看来,“以药补医”是影响医药卫生事业健康发展的突出问题。

这不难理解,医院收取15%药品加成的做法显然助长了医院趋利倾向,养成医生开大处方、多用药、用贵药的做派。

卫生部有关人士对此解释说,上世纪

50年代时国家财力不足,因此对公立医院实施了“以药补医”政策,从而保障了公立医院的运行。

不过,一些医疗机构目前仍然依赖药品收入作为重要补偿渠道,推动了医药费用的不合理上涨。病人成为待宰的羔羊,而医生成为该制度的“替罪羊”。

最终,官方和公众在认识上达成一致,“以药补医”是酿成看病贵的直接推手。

中华医学会党委书记饶克勤对记者表示,“以药补医”实质是公立医院的筹资和支付制度问题。它既是社会向医院的支付方式,也是医院的主要资金来源。

他指出,按照目前这种按项目、按药品加成付费的制度安排,在市场条件下只能激励多开药、多开检查,诱导或过度治疗。

随着医改的推进,这一制度愈发显得不合时宜。

“现在已到了非改不可的地步。”著名医改专家、北京大学中国经济研究中心教授李玲对记者分析,“以药补医”既损害病人的利益,也损坏了医生队伍,还破坏了政府形象,没有一方是赢家。

改革之辩

尽管道理已是尽人皆知,但沉痾多年,治理起来并不容易。

北大医院外科主治医师赵承渊表示,他赞成取消“以药补医”,不过前提是医疗收费应体现医务工作者的智力劳动价值。“一个医学博士苦读十多年,挂号诊疗费用还不足十元,这种漠视医务人员劳动的收费机制必须取消。”

按照官方的改革思路,要全面取消“以药补医”,也首先要理顺补偿机制,即补偿公立医院因执行基本药物制度和零差率政策之后的亏损,以维持医院的正常运转。

激烈争议正集中在这一问题上。其能否妥善处理,也成为关系到改革命运的关键。

全国政协委员、中国食品药品检定研究院研究员王国治告诉记者,他今年提案的内容之一就是建议暂缓实施取消“以药补医”政策。

王国治援引一项调查结果称,扣除15%药品加成之外,在未涉及给医生个人回扣情况下,医院额外药品收入仍高达28.7%。

他认为,医院在药品收入中除了15%的药品加成之外,显然还有药品返利折扣和医生回

扣。零差率无法切断药价与医院和医生之间的利益链,即便这一问题得到根除,在政府投入有限的情况下,也可能影响医院的正常运转。

取消“以药补医”后,医院怎么运转?在饶克勤看来,这个问题的核心在于公立医院如何回归公益性,政府必须回答为什么要办公立医院和怎样办这两个基本问题。

全国人大代表、娃哈哈董事长宗庆后认为,取消“以药补医”之后,医生的收入应该由政府“包下来”,给医生合理的收入,而且可以尝试开发医保基金。

“这个问题不难解决。”李玲表示,“我们的医疗费用已经到了22000亿元的水准,医保基金也近万亿了,这个钱拿来养800万医生,这不是小菜一碟吗?问题在于你怎么来定规则。”

“我觉得现在解决这个问题并不是方法、方式的问题,而是决心的问题。”李玲说。

而在饶克勤给出的路径中,支付制度的改革是规范医疗行为、控制医疗费用、建立医疗机构激励机制和约束机制的关键。

他指出,应加快支付方式改革,国际上常见的总额控制,按人头、按病种付费方式值得借鉴。



3月5日上午,报道两会的记者在人民大会堂楼梯口临时“办公”。

本报记者刘越山摄

## 全国政协委员、北京师范大学校长钟秉林:大学去行政化关键是去衙门化

■本报记者 张巧玲



“我个人同意取消大学的行政头衔,我当了这么多年校长,也没有什么权力,但是取消了大学的行政级别不能完全解决大学去行政化的问题。”全国政协委员、北京师范大学校长钟秉林3月4日接受《中国科学报》采访时表示。

钟秉林认为,关于大学去行政化的问题争议一直很多,“我觉得首先要看大学行政化的内涵和表现形式搞清楚,否则是无的放矢”。

钟秉林说,行政化与大学的行政管理,与

大学的行政级别有联系但却是两回事。行政管理是任何一个组织为了实现组织目标所确立的一种管理的模式和管理的方式,大学要做好,同样要加强管理。但现在把行政管理的模式、手段在大学事务管理中泛化或滥用,因此造成了人们为抨击的行政化。

大学去行政化,主要是两个方面的问题。一是大学和政府的管理。政府不能用行政化的手段管理高校,不能把大学作为行政机构来管理。政府要充分尊重学校的办学自主管理,更多利用规划、政策这种导向手段,更多利用财政拨款这种经济的手段,更多按照法律的手段加强对大学的管理和监督,更多利用行政服务的方式管理大学。

第二个问题是大学内部的管理,主要体

现在大学目前存在学术权力和行政权力两种权力并存的局面。这两种权力的存在是合理的。但现在的问题是大学的行政权力对学术权力干涉过多,使大学教师的积极性和主动性受到影响。

“搞清楚这两个问题,大学去行政化的问题就很简单了。”钟秉林说,第一,政府要完善宏观管理体制,要能支持大学自主办学;第二,大学内部的学术治理结构、行政管理设置,包括大学的学术权力、教授、学生的民主,以及制定的章程等问题,都能通过基本的规则、程序、章程进行规范。

钟秉林指出,大学去行政化,关键要去掉大学管理部门的衙门化的管理作风,真正做到为教学、科研服务,为教师、学生服务。

## 全国政协委员、中国农业大学党委书记瞿振元:政府应营造“学农爱农”的政策氛围

■本报记者 黄明明



两会期间,一些代表和委员们经常会用“这没时间”、“等会再说吧”这样的话来搪塞记者们的追问。

刚想给瞿振元递上采访纸条时,他对本报记者摆摆手。而随后,从答应采访,到专访了五分钟、十五分钟,再到他打电话给记者表示,他认为“学农爱农”的话题非常重要,需给予补充和解释。

这一态度转变,恰是瞿振元对“中国农业的发展需要什么样的人才?学校和社会应该营造一种什么样的人环境?”这一话题的最好回应。

瞿振元认为,当前农业科技人才的培养,从教育结构上应该有所调整。从教育的角度

来说,农业高等院校不仅仅要朝着努力建设世界一流水平的大学,一批高水平的农业大学而努力,要更加注重加大对面向农业一线劳动者的农业中等教育的需求。

现实的情况是,当前,在农村从事一线工作的人,能以比较高的知识和技能从事现代农业生产的数量还不够,他们的知识和技能还有待提高。他认为,当前职业教育技术中以就业为导向,面向企业的订单式培养方式仍需加强。

在大学的培养中,本科、硕士、博士不同的层次,也应有着不同的定位。博士应该更多从事基础型、学术型研究,当然也包括部分应用型研究。如果本科、硕士直接就业的话,更多的应该偏向应用型培养。

结构的调整需要观念的转变。对于“今后谁来当农民”的问题,需要重新认识。

瞿振元表示,现代农业不是传统意义上的“面朝黄土背朝天”的产业,而是有丰富内容的、有科技含量的产业。

具体到中国农业大学,每年有一部分学生是去农村,也有部分是去现代农业企业。“不能说去企业的这部分人就不是现代农业从业者,当前中国农业的发展,有相当多的一部分人就是从事现代农业。这里面内容又很广,有生产、深加工、贸易、物流、电子商务等,整个领域非常宽。务农、从事农业的思想观念也要更新、发展。”瞿振元表示。

瞿振元更为强调的是“学农爱农”的情感和实践氛围的营造。他指出,农业人才的培养,思想观念的培养非常重要。在实践环节,要让学生参与从播种到收获的全过程,让他们参与农事,通过这个过程使学生加深对农业的情感。

氛围的营造离不开政策的引导。瞿振元建议国家出台类似于“大学生到部队”的鼓励政策。对于去农村基层一线就业的学生,选择在基层创业的学生,给予明确的减免或者补偿学费等措施,以此来鼓励和重视他们。

■本报记者 潘希

3月4日,政协各界别小组讨论正式开始。建银饭店是科协和科技界委员的“大本营”。上午9点多,会场外异常安静,但会场内的委员们,正讨论得热火朝天。

“我最关注的是转制院所怎么办。十几年前,很多科研院所转制成了企业,比如中联重工,虽然现在活得很好,但没有成为行业的带头人,为什么?这应该思考。”在科技界第29组,《中国科学报》记者一进场,就听到了特别的观点。

这个声音来自全国政协委员、中国铁道科学研究院机车车辆研究所研究员黄强。围坐成正方形的会场上,几十名委员的目光聚集到了他身上。

“三一重工和徐工是这个行业的老大,过去作为科研单位,中联重工是他们的技术支撑,但后来变成了行业竞争关系,现在只能给自己做技术,不能给别人做了。”黄强显得很激动。

“转制科研院所都存在这样的问题,变成了小小的企业,也不能做行业领头人。”会场上另一位委员忍不住插话。

调整了一下坐姿,黄强接过话题继续发言:“可是再改回来不太可能,目前只能是找出出路,让他们更好地往前走。”

敢于说真话,说实话,是这几年来科协和科技界小组讨论的特点,这个特点让不少相关媒体从讨论中“挖”到了新鲜料。

在科协第23组,“每年提案都会得到答复,但答复的结果让人不是很满意。”一位委员直言不讳。

在座的另一位政协委员也表达了同感。这位曾经在政府部门工作过的委员表示,过去他是管提案答复的,很熟悉提案答复的“三段式”。“每个提案答复要加上三个东西:第一,感谢你对于某某工作的关心,今后还请继续关注;第二,这件事我们已经做到什么程度了;第三,剩下的事我们正在研究。”

听到这里,全国政协委员、国土资源部咨询研究中心主任孟宪来坐不住了:“我主张,在提案总量上可以少一些,因为个人提案免不了会重复,经过整合的应该多一点,这样提案质量可以高一点。”

上午最后一个发言的,是全国政协委员、中纪委驻中科院纪检组原组长王庭大。最近,他在四个科研院所的164名研究人员中作了一项调查,有53.04%的人一年没有参与过科普工作,28.66%的人只参加了一次活动。

“也就是说,有80%以上的研究员每年没有参加或很少参加科普工作。”王庭大的发言,再次引起了会场内的一片骚动。几位科学家身份的委员开始热烈地讨论:“不是我们不愿意做科普,而是政策和评价体系上不支持。”

王庭大说,如果科学家参与科普工作很少,那我国公民基本科学素质的提高很难短时间有所长进。“评价体制是个问题,国家顶层设计应该好好考虑和研究”,王庭大表示,要把这个建议写成提案报上去。

全国政协委员、中国航天科技集团公司第一研究院党委书记梁小虹说:“科学家这个群体非常敢于说真话,也喜欢对问题直接发表自己的见解和看法,所以大家交流起来很有收获。”

# 科学家议政猛爆『新鲜料』

## 农业界的文化“冲突”

■本报记者 黄明明

为方便小组讨论,2000余名委员按照界别分成了54个小组,其中农业界在38.39组。

相对于经济、教育等热门小组,农业组的人少,讨论也略显沉寂。按照惯例,出席的委员们对政协工作轮番发言谈感受。

主持人、农业部原副部长、国务院扶贫开发领导小组副组长范小建对其中一位委员说:“你谈谈感受吧。”

记者并不了解这位委员的身份,只猜测农业组的多半应该都是和农林相关吧。而从他的发言中,记者逐渐判断出来,他应该是位企业家,从事着博物馆建设的相关工作。

“听完贾庆林主席的报告,我内心无比的激动。报告中对文化建设的论述,带来了我们文化遗产保护的春天。”接着,他介绍了他投资3.2亿元,对某一古都的遗址进行了考察和挖掘,并以此为基础成立了一家博物馆。

“去年贾庆林主席去我们那儿考察,他看到我们博物馆的建设工作非常高兴。”说及此处,这位委员的高兴之情溢于言表,音调提升了半个分贝,“贾庆林主席握着我的手说,‘你是一个光荣的政协委员!’”

后排有委员插话说:“你说你建立这个博物馆,政府给予你多少帮助吧。比如,给批了多少地?”

“500亩,是市中心的。”这位委员坦言。

“那你们在对文物的挖掘过程中,谁来监督你呢?少了怎么办?其中一两件的价值就足够你投资的钱了。”有委员抛出了一连串的问题。

他回答说:“我们都是按照国家文物局的要求下,邀请国内著名考古专家和文物保护机构来挖掘的,每一件文物都是记录在册的。”

“还有,那你们私人博物馆挖掘出来的文物归属权到底归谁?是国家的,还是最后到你个人腰包了。”一位与博物馆系统相关的委员表示,“在我们国家现有环境下,我不主张开办民营博物馆,风险太大,无法控制。”

这位委员感觉有些被冤枉,辩解道:“我自己也是上百亿的资产,现在我每年都投四五千万进行公益事业。我犯得着去自毁名誉吗?我这么做,无非是想去做让世人尊重的民营企业家。”

他进一步解释说,请大家回去翻翻去年发的粉红色本本的提案范例,倒数第二个就是他提的,“文化遗产保护应由政府主导,应坚持保护为主、抢救第一、合理利用、加强管理的指导方针。”

“那你哪天宣布把你的个人文物和博物馆全部捐给国家,那我们在座的全体委员,集体为你起立、鼓掌。”对话,进入了高潮。

现场一阵哄笑。“跑题啦,跑题啦!”

主持人打起了圆场,笑言:“讨论得好,政协就应该言论自由嘛。这也是我们农业组五年来第一次关于文化的大讨论。”会后,记者去采访了这位企业家。他依旧畅谈民营博物馆建设的重要性,并没有介意现场的冲突,“是认识问题,很多人对民营博物馆的建设还不了解。”

39组的一位委员私下告诉记者,其实,争论的原由在于,很多委员看不惯他在这个场合宣传自己。

### 两会声音

全国政协委员、中国科学院信息工程研究所所长田静:

参加这次两会的感受:国计民生,参政议政,政协的作用日渐彰显;改革攻坚,政治协商,委员责任更加重大。贾庆林主席的报告,在五条经验中凝聚共识,服务大局,是政协发挥作用的,也是要求。把握大局,要求委员具备很高的政治和业务素质修养。而能不能在委员间、委员与政府间、委员与公众和媒体间达成共识,则决定了委员提出的意见能否最终发挥作用。

今年,改革创新进入了攻坚期,要求委员们把握大局,服务中心,更好地发挥作用。作为一名科技工作者,我今年更关注国家科技体制改革,并将提出见解,希望能有所推进。

(本报记者王静整理)

全国政协委员、中科院可持续发展战略研究组组长牛文元:

今年两会上,我比较关注如何提高GDP的质量。很长一段时间,许多人只比较关注GDP的增速和数量,而且以此来衡量政绩。但其实这一切都是用拼资源、拼消耗、拼环境容量换来的。

这种现象与管理也有关系,过去经常讲“张书记记,李书记填”,交学费的事太多了。这个书记来一套,创造了GDP,下一任书记又来,说这个不对,GDP还是有。他们在创造GDP,但损伤了很多GDP的内涵。

所以,今年我们主张是一定要提高GDP的质量。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最终表现形式,就要看换取GDP的时候,花了多少成本?这个成本包括自然成本、经济成本、社会成本、管理成本。

(本报记者潘希整理)

全国政协委员、中国工程院院士刘经南:

现在社会上流传这样两种观念:一是认为中国没有诺贝尔奖获得者;二是只要谈教育就言必称西方,认为欧美国家的教育是好的。总之,这两种观念都在说我们的教育是失败的。

衡量现在的教育成功与否,最重要的是看教育对我国的经济、社会、科技、国家安全、文化建设等方面的发展所作的贡献。改革开放30多年来我国经济腾飞,人才是重要支撑,而这些人才大多是我们的教育培养的,而不是靠美国、欧洲大学培养的。而且,这些年国家的迅速发展,是教育为无的放矢”。

钟秉林说,行政化与大学的行政管理,与

钟秉林认为,关于大学去行政化的问题争议一直很多,“我觉得首先要看大学行政化的内涵和表现形式搞清楚,否则是无的放矢”。

钟秉林说,行政化与大学的行政管理,与

中国教育发展不能自卑,更不能妄自菲薄。(本报记者刘越山整理)

全国人大代表、中国工程院院士杜善义:

基于成果报奖必须经过鉴定的要求,每年全国各地存在大量的各类成果鉴定会,每一个成果鉴定都会消耗大量的时间、精力和财力。建议取消科技成果鉴定。

目前鉴定会多数情况下不能够实事求是地评价成果,多存在XX成果达到“国内领先”、“国际先进”或“国际领先”等等说法,实际并非如此。

成果鉴定必要性不大。因多数科研项目都经过验收,额外的鉴定只是为成果报奖而规定的程序。

理论和基础性研究成果的水平主要由国内外同行的认可度来确定;应用和工程性的科研成果,用户和市场可以作评价。

(本报记者张巧玲整理)